

论“人工智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

姜绳¹, Peng Lu², 买西玉³

中国上海市大连西路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550 号邮编 200083

电话: +86 13260057961 邮箱: shengjiang@shisu.edu.cn

收稿日期 2020.4.22 修回日期 2020.6.15 接收日期 2020.7.2

摘要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化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同时也给全球化带来了治理困境。2017 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科学家们预言二十一世纪中叶将迎来“奇点时刻”,在本世纪末将会迎来“智人社会”。在此背景下,人类的全球治理该如何面对?人类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人类能否摒弃人性之中的弱点,本文梳理人类全球治理观的概念缘起、不同发展阶段,与未来“智人社会”出现时的全球治理观进行比较,并以东西方人性论为视角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对比研究,得出以东方群体本位的文化基因指导下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能摆脱全球治理的困境和应对“智人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关键词: 人工智能、全球化、治理困境、人性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

¹姜绳(1987 —),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传播等研究。

²Peng Lu(1989 —),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共外交,战略传播等研究。邮箱: winstonlulandto@sina.com 电话: +86 18521775789

³买西玉(1988—),女,硕士,从事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影响等研究。邮箱: maixiyu@139.com 电话: +86 13761885510

一、引言

2017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间节点，在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上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月份谷歌公司推出一款将通过数学模型下的自我对局和深度学习，只靠智能计算机自身深度学习的方式成长的新版 Alpha Go，它以骄人的战绩战胜了人类的顶级棋手；据 TOP500 组织统计，截至 2017 年 11 月份，全球 500 台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之和为 85 亿亿次每秒；12 月 2 日，由安凯客车研发制造的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举行全球首发，该无人驾驶公交车在深圳福田保税区投入运行；10 月 27 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女性”机器人索菲娅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她也因此成为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在人类的身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让人应不暇接，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人工智能下的机器人（以下简称智人）。这些智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最终将会脱离人类的控制采取自我更新的手段产生人类无法控制、难以捉摸的新技能，从而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群体——智人群体？并由智人群体构成智人社会？那么，在未来若干年，智人群体会不会抛弃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如果存在，那么智人群体又与人类之间是什么关系？全球由谁来治理？人类和智人类之间如果出现矛盾又有谁来主持公平和正义？在未来某个时刻，智人社会的创造力远远超过人类社会的时候，人类会不会也像现在的动物一样被关进笼子里？人类面对未来无知而又极有可能短期内出现的困境，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和伦理约束，是积极面对未来的新挑战还是坐以待毙？笔者尝试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人类全球治理观的概念缘起、不同发展阶段、历史所起作用进行梳理，与未来“智人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治理困境进行比较，和以东西方人性论为视角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对比研究，人类社会要想摆脱全球治理的困境，应对“智人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就应当以东方群体本位的文化基因为基奠、以纵向传承的“天下观”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来化解即将到来的治理危机。

二、“智人社会”未出现前的人类全球治理观

人类自古都在追求对某个空域的管理或治理。在古代中国《说文解字》中记载：管，如箴，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管是名词时有三义，其一，古代官吏使用的毛笔或印章；其二，竹子制成的吹奏乐器；其三，长形中空圆柱形之物；管是动词时有行使权力、处理职责、管辖治理等涵义。理，治玉也。理是动词时有两义，其一，古代锻造玉石并使之有形；其二，使之有序、安排井然；理是名词时也有两种解释，其一，条纹、理纹；其二，秩序规则、万象道义等；

近代，由美国与英国的管理学家对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而“全球治理”的概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国际组织制度化演进过程中，冷战后在西方社会逐渐兴起的国际政治理念，是对全球交往实施管理和协调的规则、制度和组织的总和，是国际社会建立新秩序的一个努力方向和目标。通常来讲，是追求对跨国机制的设计、建立及其对经济或其他可能性行为的控制。(梁展，2002，页 287)但这种理念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空间领域的位移、科学技术的革新等综合因素促成并发展而来的。然而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治理理念发端的时期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开始初现端倪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 15 世纪

末到 16 世纪初，一个“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欧洲世界经济产生了。最初所产生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Imanuel Wallerstein, 1998, p. 12)

18 世纪中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全球化相对于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等全球化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迅速成长期。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急剧膨胀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使得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加深。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遍布全球，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度剖析而映射出经济全球化背后人性贪婪的本质，“用从被剥削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剥削者的商品。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的追加资本。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生资本’。”(Karl Marx, 2006, p. 188.)而推演出除过两者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矛盾外，还有更加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开始逐渐地影响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各个领域。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贸易、投资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状态下的主权国家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之中，贸易壁垒森严全球经济滑向破裂的边缘。随着二战的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一道构成了世界经济、金融、贸易的三大支柱，反映了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制度化方向的发展。(刘德斌, 2016, 页 518-519)这也充分反映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经济全球治理规范化的开启。但随之而来的是美苏争霸、两级对抗、冷战爆发，这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有所



迟缓，东西方经济贸易、货币金融关系几乎停滞。在此背景下，对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产生不可逾越的负面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兴起的高新技术革命以及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贸易、金融交往的便利，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间接地导致了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使得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产业结构升级、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成为可能和必然趋势。

在国际关系的诸类关系中，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类关系不可能同步发展，而是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向前运行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诸类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总要保持一定的治理迟缓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是，如果这种治理迟缓过大，就会带来治理迟滞。全球治理理念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历史渊源主要是以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为标志的，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瓦解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诞生了主权国家这一独立的组织形式，后来又成为亚非拉人民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时期：1815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废除，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政治文化治理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封建主义制度所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进入世界体

系的国家基本上是欧洲国家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开拓地。欧洲的封建主义专制国家逐渐被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所取代，整体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君王的个人利益进而成为各国最高的追求目标。欧美的政治文化是积极支持经济贸易、民主自由向全球扩展，同时它们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故此，在以“均势原则”来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世界政治文化秩序与全球治理秩序主要是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圈内游戏，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还未从欧美政治文化悄悄进入后引发的“政治文化震荡”，甚至“政治文化崇拜”中间清醒过来。

第三个时期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此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不健全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现实的体系，它所制造出来的治理体系就是从来没有稳定过的国际关系格局。当危机来临之时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的失衡与失序也就接踵而至很快就被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冲垮了。

第四个时期是 1945 年二战之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从根基上动摇了有欧洲国家主导的国家关系治理体系。法西斯国家的惨败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胜利催生了以美苏为首的两级世界格局的诞生，也把意识形态之争糅合进了现代国际关系繁杂的争霸序列之中。在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从根本上来讲是苏联的政治文化治理世界还是欧美的政治文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其实，这些早已在殖民地时代所积累的文明之间的张力被两极争霸格局人为地压制了，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压迫，本应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被释放出来，可是



冷战期间所产生的恶性竞争、仇视态度、扭曲势力压制了世界性释放和多极化格局的显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时期的全球治理是服务于西方文明秩序的。

然而随着 1989 年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全球治理理念进入到了第五个时期，即“一超多强”的全球治理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正在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的国际关系不再是纯粹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与各国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也不再是单纯的政府间关系，而是与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类型的国际组织所构成的有机联系；也不再是一个国家就能解决全球性问题，而是需要人类共同跨越民主国家的界限和主权国家行为体的束缚，来共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民族分离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各类型的气候问题、文明和种族冲突、宗教纷争和文化排外等全球性问题。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指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应该发挥相应的全球治理作用。对此，在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能发挥更大作用寄予厚望。1995 年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全球治理方面的设想，例如签订“全球契约”，建立“全球政策网络”，维护“全球规则”，形成“全球法律秩序”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19）全球治理已逐渐成为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并随着各个主权国家行为体和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组织的共同参与治理、一起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而慢慢形成的新理论范式。

通常来讲，“全球治理”大致等同于“无政府治理”，这里所讲的无政府并不等同于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下，把治理主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关系视为双方交战状态的零和博弈；也不是格劳秀斯主义下，基于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实体之间类似于博弈、分配、生产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也没有达到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所描述的主权国家间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两大组成部分——维护者和破坏者；更没有达到伍德罗·威尔逊所主张的理想主义要求。而是存在于第三部门的力量，介于主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制度安排，试图为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方案。这些理念是基于人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概念如无政府状态、霸权主义、贸易壁垒、等级制度、战争博弈、强权政治等不和谐状态的反思和绝望。而全球治理就是要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跨国影响的各种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的、急剧的世界网络的规则系统。（James N. Rosenau, 1995, p. 13-43）全球治理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除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经济和社会调节，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种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James N. Rosenau, 2001, p. 5）其全球治理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社会，这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即一个有共同价值观和事业来指导的管理体系，彼此间通过



信任、友善达成共识并建立权威，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目标而构建全球治理的主动精神。就目前来看，人们还是习惯于从主权国家和自由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还是从传统意义上民族种族的独有性、主权国家的排他性、政府体制的固化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等方面狭隘的思想状态来看待当下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变化，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看待全球化、从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通使得人们不断跨越时空障碍看待全球化、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看待全球化、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人工智能显现看待全球化、从机器人和智能人类的自我学习和创造看待全球化……世界将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恰当地治理全球性问题？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人类社会将如何面对“智人社会”？将怎么迎接来自于“智人社会”的挑战？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对于全球治理所要面临治理困境的崭新课题，但从东西方人性论为视角进行政治哲学的对比研究来看，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三、“智人社会”未出现前人类社会的人性论主张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演绎和创造着，同时也被历史影响和塑造着。而人类创造历史的行为其本质来源于人性善与恶的抉择，人性存在的多样潜能和普遍的追名逐利性，而这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人性的可塑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交织相融、互动相适中衍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历史行程的缤纷样态，但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的人们由于人性始作用而产生了文化基因的差异，导致了人们之间的摩擦与平滑、冲突与缓和、战争与和平。对人性的善与恶从古至今都是见仁见智，无论是性恶论、性善论还是非善非恶论，都存在于人性最初的根性之中，无法改变的自然自利倾向。由此而产生的东

西方文化基因的迥异而带来了善恶评判的标准发生根本性不同，以此产生的政治模式与治理制度都产生了不同偏好。

（一）西方人性论的主流观点

逻辑思维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车轮，催促着人类不断向前。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逻辑思维的源头，为人类探索政治哲学思维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柏拉图作为第一位有完整著述传之于世的先哲，他的思维逻辑开启西方应然政治逻辑范式的先河，也为后来的哲人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人性伦理、内在本质、逻辑演绎、政治制度、治理原则等诸多问题的理路与视域指明了方向。

柏拉图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人的天赋是迥异的，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事情是最好的抉择，但是人的欲望和人的需求又是缤纷多样的，这就产生了个人能力的片面性与生活所需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因素在于人们用分工合作、取长补短的方式弥补人性缺陷和满足各自所需的基本要求，并使人们在一定伦理约束和法制规范下和平共处的生活同一片蓝天下，结果导致城邦作为一个服务合作体系的出现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基于人们彼此之间自愿的原则，而是基于人性自身的缺陷和契约法治的约束，这个过程也是对人性本恶和以个人为主体思维逻辑而自然生成的有机过程，这也构成了从契约关系到法治社会再到宪政政权的西方社会文化基因的清晰脉络。

西方主流社会政治生态的横向结构就是由这样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所认为的民主与自由、程序与制



度、契约与法治等诸多关系都是在神本位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化认为“神”创造了一切，制定了法则让所有的人遵从，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共同履行人与神之间的契约。故此，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建构的基本政治框架。赫拉克利特说：“对那永恒存在着的逻各斯，人们总是不理解，无论是在听到之前还是最初听到之时。因为尽管万物根据这逻各斯生成，他们却像是对此全无经验的人一般，甚至在他们经验了我所讲过的那样一些话和事情时，而我已按照自然分别了每一个东西并且指明了这是如何。”而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哲学暗含着两种哲学转向，道德和政治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个人能够认识自身的理想和善举，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追随善念和主持正义的人，用国家的理想和善举治理的城邦就是一个理想、公正、友善的城邦。

西方的文化基因强调人性恶欲是根深蒂固的，由此众多的哲人们逻辑思维就是对人性的贪婪、兽性、偏私等恶相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论证。而现实的政治只能由无法根除红尘私欲的肉体凡胎来执行，相对健全的治理制度建设只能直面残酷的现实、正视人内心的阴暗，人们所推崇的法律条文则是遏制人性恶最坚固的制度城堡。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法律也为人人平等、交替执政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人们自认为较好的程序化、正义化、公平化的制度保障。

（二）中华人性论的主流观点

之所以先贤哲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辉煌的一笔，就是因为他们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意志，有别于普通人的自由意志。普通人的自由意志是靠一种天生的直觉而获得的信念，而这种靠直觉

产生的信念是不会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的。哲学家们的自由意志有赖于思想意识中建立起来的特殊前提，把这种自由意志的信念和事物的整个形式、气质、方式都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又有着不同的哲学思考，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一个哲学家的真在于他的这个真理是经过推理而获得的，使他获得真理的必定是论证，而不是假定。所以思想不是专家的事，不是所谓哲学家或自称为思想家的人的事。最好的哲学家就是能够最单纯思考的人。

人之所以为人者，在这一意义上，人之思源于心，心亦即是性。如老子曰：“自其得之于道而言谓之德，自其聚于人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谓之性。”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陆象山说：“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王阳明也说：“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传习录上）人之所以为人者，是然有心。《乐记·乐本》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自命出》曰：“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可知也。”（简 37-38）（向世陵，1999，页 37-38）曾子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无心之縻驰、无心之势用、无心之官能、无心之辨析，心性必丧耳。故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楼下》），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而不闻声，故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



谓之德。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故知性而学养，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诚意、正心与修身、养性互为兼顾，以一贯之，明明德心性之本故。

故真理皆唯一，言表各不同；仁义礼智信，道德本心生；心善言性善，虚空以破执。

天道人性的探寻使先秦诸子的论述，以“人本性善”和合论的群体本位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根基，成就了中國聖人們的精神內涵。即“內聖外王”之道，“內聖”是人性內在的修為，“外王”是人性外在的功用。費孝通先生根據綿延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基奠提出的“差序格局說”，他認為中國自古傳承的社會是以“個體”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水波紋層層疊疊向四周散去，由近及遠，形成“差序格局”的漣漪結構。這種社會結構體現的是從“個體”向“群體”映射的社會結構，是由內向外垂直聯繫的紐帶，每根聯繫的紐帶都被一種道德要素約束着、維系着。也就是說，整體的社會結構是從“個體”美德的身份關係縱向擴展到“整體”社會德治仁愛兼濟天下，再到仁政政權的普惠天下觀，這就是傳承延綿了數千年中國社會的文化基因。垂直縱向結構是由這樣的基因所決定的，即中國社會所認為的權威與正義、民心與民意、觀念與德治都是在民本位的基礎上建立的。家國一體、以家推國的垂直結構、層層深入的構架體系，造就了中國社會基本結構的歷史形態，由“孝”與“忠”相通到宗法家國一致、父權君權的同一，其內在的關係正是遵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仁政德治”邏輯。中國的文化基因認為“自然孕育”了一切，萬事萬物背後都隱藏着道理，即“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人自己去悟天理，

然后顺从自然，人自然就会吉祥，就不会不利。故此，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建构的基本政治框架、维系的东方思维逻辑、衍生出绵延不断地社会生态。

（三）西方人性论与中华人性论的主流观点比较

综上所述，人性论本身是西方和中国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几乎是每一个哲学流派都讨论的话题。总体来说人性论可分为四类：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有善也有恶、人性无善也无恶。人性论主要是以人格为中心的讨论，人格上层级不同、层级的差异不论是由下向上或是由上向下，都是完整的生命体的内在关联。然而西方人性论与中华人性论有着相同特点也有不同区别。

任何人都有一定的价值观，这样人类才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假如完全没有价值观，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为或追求，那他事实上就同鸟兽无差异了。所以，无论西方人或是东方人在小时候阶段就会学习一些价值判断，此后不断的修正充实，最后形成自己的规定并得以融入社会。同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若想在世界民族立足生存，即需要也必然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也可以叫做是非观、生活观、文化观，或者叫做生命哲学。这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行为举止的终极指针。

若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人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对照起来看，是各具特色。关于个人的认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对个人关注内容并不多，并没有形成非常系统的学说，其中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一些基本生理需求和食欲和性欲是合理的。但当这些人的欲望和天理发生矛盾，应该服从天理。



此外，相信很多人相信宿命，发展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弱的。而西方人则认为应该尽可能在有限的法律和道德之下解放人性而不是束缚人性，不但如此，理论家们还建立了一整套人权观念，认为个人应该被承认具有不可被剥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若干天然的权力，使人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所有个人都想要、都拼命在意和保护的东西。此外，西方还主张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创造人的个人能力和价值。

关于人伦，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如何相处，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提出很多思想，并且主张人们互爱互补，中国从古至今主张敬老爱幼，重视家庭，强调家庭有序，并且推及社会秩序，认为等级是自然合理的，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做人做事。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否定等级社会，关于人伦的基本观点是“平等”二字，并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在社会环境中，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对后天竞争中若出现不平等，要以博爱和人道去对待。

四、“智人社会”出现时的“智人类”全球治理观

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现代人类大约在距今五万年前就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类还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者，直到几千年前人类能够用语言沟通交流、用文字承载文明、制造并使用工具、团结协作构建人类群体，从而战胜了地球上的所有大型动物之后才成为地球的真正主人。历史的车轮来到了 21 世纪，2017 年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拐点，随着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纠缠、机器人等可知的和不可知的科学技术爆发式发展，以及人工智能自我学习和自我创造力的不断增长，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奇点时刻产生一个新的群体——智人群体，而由这个

智人群体构成的社会就是“智人社会”，那么它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类还、能继续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吗？

奇点(Singularity)在英文中有异常、奇特等释义。在数学概念中奇点表示不可定义的点，即分母为零的情况。在世人所熟知的天体物理学中，奇点被描述为宇宙起源时的状态。(JOEL SMOLLER BLAKE TEMPLE, 2003)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伽莫夫正式提出大爆炸宇宙理论。“大爆炸宇宙论”认为：宇宙是由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140亿年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20世纪末，对Ia超新星的观测显示，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因此科学家们推测宇宙可能大部分由暗能量组成。(威廉·H.沃勒，保罗·W.霍奇，2009，p. 261-267)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目前所存在的急剧膨胀的宇宙向相反的方向倒推的话，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最终它收缩到原始的某一个奇点，而这个奇点时刻是宇宙大爆炸前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如果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质量互变规律理解的话，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奇点时刻。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以及由于事物内部矛盾所决定的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这个规律，提供了事物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的观察事物的原则和方法。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因矛盾而引起的质量互变的发展过程和状态，在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对立统一性和能量守恒性的特点。奇点时刻之前所积聚的质量和能量总和与奇点时刻之后所扩散出去的质量和能量之和是相等的。这也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所表述的质能守恒定律，是能量守恒的一种实存形式。关于宇宙奇点的始发于什么时刻？又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奇点究竟存在不存在？等等诸多未解之谜都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但就现在人类所观测到的宇宙还在以极大的速度加速膨胀来说，我们毫无疑问应该肯定这个宇宙奇点是存在的、奇点时刻也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根据现有的科学认知，在浩瀚的宇宙中凡是发生质的变化的事物就与奇点发生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技术层面来说，技术奇点的概念最早是由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的。他认为：“技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将朝着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展，一旦超越了这个奇点，我们现在熟知的人类社会将变得大不相同。”(STANISLAW ULAM, 1958, p. 1-49) 由此可知，人类所面临的奇点犹如宇宙之始的奇点时刻，有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十一世纪初，奇点大学的创始人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一书中阐释了人类与技术结合的观点，并把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那一时刻叫作“奇点”。(雷·库兹韦尔, 2011, 页 11) 库兹韦尔不仅是这一观点的提出者而且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实践者，他的观点带有未来预言家的味道，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前沿的科学家都对库兹韦尔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但也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人工智能战胜人类表示出了悲观情绪，2015 年 1 月 12 日，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和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参与签署的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宣称，“彻底开发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人工智能是超过核武器的对人类的最大威胁”等等。(STUART RUSSELL TOM DIETTERICH ERIC HORVITZ ETAL, 2016, p. 3-4)

之所以人工智能让众多科学家一方面表现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又显露出不寒而栗，主要原因归结于人工智能具备自我学习

和自我创造能力。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提出“知化”的概念来阐述人工智能，即赋予事物以认知和学习的能力，“把机敏的头脑置入普通事物之中才能带来真正的颠覆”（凯文·凯利，2016 页 29）2017 年 10 月 19 日，人工智能机之间对弈围棋棋局时，新版 Alpha Go 经过三天的自我学习而升级成 Alpha Zero，并以 100 比 0 的比分完胜 Alpha Go，而在此学习过程中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棋谱，并且是从零基础开始学起。最近科学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自我学习，还可以自己发明出智能机器人之间沟通的语言。这是一种被称为“遗传编程”的技术，“它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并且运用自然力量，为一些人类要花很长时间（甚至数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它也可以用来编写高功率的创新软件”。（詹姆斯·巴拉特，2016，页 76）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创造力已经到达人类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个体看作是由许许多多的元素组成的话，其中最主要的元素是碳、钙、铁等元素。而智能机器人则是由硅、钛、镁等为主的元素构成。当人类对某事做出判断的时候，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就开始活跃，脑部神经元就会放电进而使神经元彼此之间发生联系，然后反馈到中枢神经系统并发出指令，做出抉择或是判断。由于人工智能具备了自我学习和自我创造力，并且还在以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这必将导致一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转变。这一技术的转变表现为人工智能摆脱单一终端的抉择，进而演化成为一种集体智能的选择。目前的人工智能抉择是将个体提供的输入值进行线性回归的均值处理，在个体之间并没有产生相互影响，这就容易导致群体性偏差。而群体智能则是“一群大脑的大脑”。其抉择方式通过人工智能内部自我学习后的算法，



通过输入大量的可执行单元，彼此间同步运行，并整合指令、统一计算、权衡替代方案，最终以一种“足够激励量”的方式确定并最后形成特定的决策。(LOUIS B. ROSENBERG, 2015, p. 658-659) 而人工智能对某事做出判断的时候，也类似于人类神经元之间彼此联系的电子回路，并通过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来做出选择或是判断。虽然两者都有判断但其本质不同，也就是说两者的算法不同，导致最终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随着人工智能自我学习和自我创造力的不断提升，在未来的某一奇点时刻，人工智能将全面的超越人类，演化为超级人工智能——智能人类。很有可能由此而组建成智人社会的新的纪元——智人纪，而人类所组成的纪元称为“人类纪”，犹如人类称呼恐龙生活的时代为侏罗纪、白垩纪一样。福柯曾说：“如我们的思想是考古学所展示的，人是近时代的一个发明，并且人也许正走向其终结。”(福柯, 2001, 页 386) 福柯并没有说人不存在，而是说，当我们以系统的方式开始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时，或是在未来的奇点时刻以后，人与智人对立起来的时候，或是智人也像人一样有善与恶的群体之分的时候，我们使之与人性相联的所谓普遍本质的聚合物就显现在历史中了。这种发明对其所描述的一切是有害的，因为，正如随机分类一样，它所描述的与其所排斥的一样多。随着它的效用日益减弱，并且我们意识到它的危害，“人”也将渐渐消失或者说人类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价值。有科学家预测，人工智能全面超过人类的奇点时刻大约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叶，依此而推论由智能人所组成的智能人社会会出现在本世纪末。鲍姆、格泽尔等人曾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少数人工智能专家认为，到 2020 年人工智能就有望达到人类的水平。但总体而言，计算机科学家、机器人

技术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更为保守，他们认为，2028 年实现的概率略高于 10%，2050 年的概率将会高于 50%，到 21 世纪末的概率则为 90%。(SETH BAUM & BEN GOERTZEL & TED GOERTZEL, 2011, p. 185-195) 如果未来奇点时刻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由智能人组成了“智人社会”，那么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新挑战？接下来在与奇点时刻来临之前的时间赛跑中人类能否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五、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人工智能新挑战

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所出现的奇点时刻，目前人们都只是在推测。虽然人们对奇点时刻出现的智能人类有所忌惮，但这项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或是对人工智能技术所产生的智人根本不可能超越人类而心存侥幸，由于人工智能背后存在着极大地利益驱动，人类会存在于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之中。

尽管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于悖论之中，但是人类已经无法停下前进的步伐，其原因就是人性使然！由人性而导致的人类行为，也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仁人志士争论不休并且始终无法达成意见统一的人性善与恶之辩。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self-conscious being），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与生俱来的，而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欲望也是与生俱来的。（肯尼思·华尔兹, 2012, 页 14）人是有着无限欲望的有限存在，一个自认为是巨人的侏儒、自认为是智慧的愚昧、自认为高傲的低俗。出于人类自身的自私自利，人们绞尽脑汁创立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理论，并试图将之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体系。人类自存在地球之始就成长于动荡与不安之中，人们为追逐利益最大化和人们所向往的和平试图使自身拥有



绝对的安全。但是，罪恶与冲突缘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的行为，自私、被误导的侵略性冲动和愚蠢，贪婪、傲慢的互不信任性交往和无知，好斗、占有的无法抑制性本能和驱使等等这些人性中的痼疾，与人性向善、提升人类道德、启迪人类良知、追逐人类和平的愿望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推动着人类向前探索未来的勇气和实践。战争的苦难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承载的重量，更是这类人民可以保持清醒并涉取力量的源泉。它是对战争、不和谐的一种警惕，是对和平、和谐的一种渴望和表达。终结战争的、不和谐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和平、和谐的理念，这是人类理性的成果。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习近平，2014）对和平的梦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追求，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夙求与期盼，还是今天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梦想，更是努力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方向。

由于人类的本性中存在着两面性——善与恶，即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是对立的实存而最终又无法实现的统一。人类的发展史中，人们所存在的轨迹又不无完全是按照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其发展中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故此，冥冥之中虽不可言说，人性却被假定为亘古不变的，并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依据，但人类的行为还是从人性之争转向了它处——依据这一假设，人性无法被改变，然而社会——政治制度确实可变的。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人工智能的推进，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面临人工智能的奇点时刻和“智人社会”的新挑战，全球治理的困境已经摆在各国政要的面前，成为心系天下苍生的有识之士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同时，

人类将被迫应战，也必将对自身所造就结果做出回应。那么在未来如何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挑战呢？人类怎样摒弃人性之中的邪恶意识和人类的错误行为，从而避免人类的自取灭顶之灾，使得和平与安详惠及全体人类呢？

恰逢人工智能出现拐点还没有到达奇点之际，2017年的金秋十月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迎来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19，页6-19）

如果在人工智能的奇点时刻来临之前或是在智能人类社会构建起来之前，我们人类遗弃人性中的恶、愚昧、好斗，用人性中的中善、理性、道德来加以约束，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导全体人类的意识形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社会——政治制度管控人类的自毁行为，才能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才能更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就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而言，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综合。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如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军备、战争、恐怖等危险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持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也意味着世界发展的动



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出现了问题。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这也是导致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同时，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指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机械威武注意观念掌握之中，它相信世界是物质的，只看得见有型的物质，只追求物质和物质享受，在西方文明牵引之下，人类几乎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享受的不归路。如此看来，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与西方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严密且完整的逻辑。首先，坚持共享共赢，建立合作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共赢，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首要内容。国家之间交往看中的是国家利益，只有具有共同利益才能展开合作。其次，坚持共商共建，在国际交流中合理管控意识形态分歧，建设共同体。只有意识共同，没有分歧才能形成合理良好的国与国间协商。这一重要论述，也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处理中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然的共同价值。最后，坚持共建共进，超越你输我赢态势，建设行动发展共同体。有力维护和保障全人类共同利益，彰显全世界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共同发展。因此，唯有中华人性论所提倡并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摆脱全球治理的困境和应对智人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 Baharat, J. (2016). *Women zuihou de faming* [Our final invention](Lv Jiayi Trans). Beijing: Electronics industry.
- Baum, Seth D., Goertzel, Ben, and Goertzel, Ted G. (2011). How Long Until Human - Level AI? Results from An Expert Assess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8(1): 185-195.
- Foucault. (2001). *Ci yu wu--renwen kexue kaoguxue* [Words and objects --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ities] (Mo Weim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 Kelly, K. (2016). *Biran* [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Zhou Feng, Dong Li, Jin Yang Trans). Beijing: Electronics industry press.
- Kurzweil, R. (2011). *Qidian linjin* [Singularity approaching] (Li Qingcheng, Dong Zhenhua, Tian Yuan Trans).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 Liang, Zh. (2002). *Quanqiu hua huayu* [Global discourse].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Liu, D.B. (2016). *Guoji guanxi shi*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Marx, K. (2006). *Zibenlun* [Das Kapital](Zeng Lingxian, Bian Bin, Jin Yong compilation Ed. & Trans). Beijing: Huaxia press.
- Rosenau, James N. (1995).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1, 13-17.
- Rosenau, James N. (2001). *Meiyou zhengfu de zhili: shijie zhengzhi zhong de zhixu he gaibian*[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Zhang shengjun, Liu xiaolin, et al.Tran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Rosenberg, Louis B. (2015). Human Swarms, a real-time method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Life 2015* (pp.658-659).
- Russell, S., Dietterich, T., and Horvitz, E. etal. (2016). *Letter to the Editor: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obust and Bene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Open Letter*. *Ai Magazine*, 4, 3-4.
- Smoller, J., Temple, B. (2003). Shock-Wave Cosmology Inside a Black Hol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 (20) (pp.11216-11218).
- Ulam, S. (1958). Tribute to John von Neumann. *Bulletin of*

-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3, 1-49.
- UN. (2019, October 28). [UN secretary-general Annan's report at UN millennium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millennium/sg/report/ch2.htm>.
- Waller, W.H., Hodge, P.W. (2009). *Xingxi yu xingji bianyuan*[Galaxies & The Cosmic Frontier] (Shuai Qiexing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Wallerstein, I. (1998). *Modern world system (V.1)*.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Waltz, K. (2012). *Ren, guojia yu zhanzheng: yizhong lilun fenxi* [Man,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Xin Qia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Xi, J.P. (2014, December 14). Zai Nanjing da tusha sinanzhe guojia gongji yishi shang de jianghu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memorial ceremony for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Guangming daily*, p.2.
- Xi, J.P. (2019). *Zhongguo gongshan dang di shijiu ci quanguo daibaio dahui gongzuo baoga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6-19.



Xiang, Sh.L. (1999). Guodian zhujian “xing” “qing” shuo
[The theory of "sex" and "affection" in guo dian
bamboo slips]. *Confucius studies*, 1, 37-38.

On the Governance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heng Jiang, Peng Lu, Xiyu M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Tel.: +86 13260057961 Email: shengjiang@shisu.edu.cn

(received 22 April,2020) (revised 15 June,2020)

(accepted 2 July,202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revolution has brought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governance dilemma to globalization. 2017 will b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scientists predicting a "singular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a "Homo sapiens society"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this context, how should human global governance be faced? What is the destiny of mankind? People could abandon the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mbed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view origin,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s, and the future of "homo sapiens society" when comparing to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from East to the Wester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s the angle of comparative study withi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in the East group standar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gene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sponse "brings the new challenges of homo sapiens socie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dilemma, Human nature comparison, Human destiny community